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本土工商管理学建设的时代要求与实现路径

陆华良,冯利伟,杨 强

(南京审计大学 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摘 要]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我国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传统以效率和增长为核心的工商管理范式在面对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时,其单一目标结构与多元发展目标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本研究在系统梳理传统工商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知识体系视角出发,构建“战略导向—学科范式—知识生产—人才培养”四维分析框架,分析可持续发展视角下本土工商管理学建设的时代要求与实现路径。本土工商管理学需在战略导向维度强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学科定位,在学科范式维度实现由以“效率—增长”为单一目标的范式向以“可持续—高质量”为导向、重构效率内涵的复合逻辑范式转型,在知识生产维度推动问题导向、本土嵌入与跨学科协同,在人才培养维度由职能型经理人培养转向可持续治理型管理人才培养。基于此,提出学科规划与国家战略对接、可持续导向研究评价机制优化、课程体系与实践平台协同改革等路径,旨在为本土工商管理学可持续发展转型提供以知识体系重构为核心的理论框架与制度参照。

[关键词]工商管理学;可持续发展;学科范式;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239.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833(2026)01-0001-10

一、引言

21 世纪以来,全球性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剧,气候变化、生态退化与社会不平等挑战相互叠加,促使企业经济发展范式由单一追求“效率”增长转向强调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并进的“可持续发展”^[1],联合国通过的《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更是将“可持续发展”范式制度化为全球治理和各国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2]。在此进程中,企业不再仅仅是创造利润的经济单元,而是成为绿色转型、社会责任履行与共同富裕实践的关键行动主体与治理节点^[3]。这一根本性转变对工商管理学科的价值导向与知识体系提出了深刻而紧迫的革新要求。

在中国语境下,这一全球性范式转型与国家战略演进高度契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将高质量发展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系统部署,强调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坚持高质量发展,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这些重大论断,从顶层设计层面为新时代中国工商管理学的建设锚定了方位、提供了根本遵循。

历经七十多年发展,中国工商管理学科已取得显著进展,然而面对时代发展和国家需求的变化,一系列深层次的结构矛盾日益显现,主要体现在:第一,在理论构建层面,存在“西方理论移植多、本土建构少”的倾向。尽管 ESG、绿色创新等议题研究成果丰硕,但大量研究仍侧重于应用或验证源自西方制度情境的理论框架,对于中国特有情境下(如“双碳”目标中的央地政策互动、国企与民企的差异化 ESG 实践逻辑、新质生产力要求下的组织形态变革等)所蕴含的独特管理问题与理论创新点的挖掘尚不充分^[4]。第二,在知识转化层面,存在“形式话语强、实践叙事弱”的倾向。许多研究未能将学术发现有效地转化为可供企业管理者、政策制定者理解和运用

[收稿日期]2025-12-1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273016);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JSGHBSBZ20340);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课题(2023YJSJY-KT007);南京审计大学高教研究课题(2023JG018)

[作者简介]陆华良(1972—),男,江苏苏州人,南京审计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从事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冯利伟(1979—),男,内蒙古赤峰人,南京审计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从事企业管理与管理审计等研究;杨强(1992—),男,河南驻马店人,南京审计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从事工商管理领域研究,E-mail: yangqiang@nau.edu.cn。

的实践语言与本土化案例,导致知识供给与实践需求之间存在张力。第三,在话语体系层面,存在“跟随议题多、引领范式少”的倾向。学科总体上仍处于对国际学术议程的跟进与回应阶段,而基于中国大规模、复合型可持续发展实践所提炼的、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原创性概念与理论范式仍凤毛麟角。这些矛盾不仅限制了学科知识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反哺能力,还影响了中国本土管理学在国际学界以自身话语进行系统性表达与传播的效能^[5]。

从知识构思的底层逻辑看,上述问题集中体现为我国工商管理学知识体系的结构不平衡。一方面,学科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以内嵌西方制度情境与价值前提的理论为核心,存在“理论中心在外、经验样本在内”的张力。另一方面,关于中国实践的大量经验研究尚未有效上升为稳定的理论构造与概念体系。学界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体系展开的讨论指出,要从知识谱系和知识结构层面系统重构管理学的哲学基础^[6]、核心范畴与中层理论框架,以中国实践为根基搭建起自主的管理知识体系^[7]。与此同时,“讲好中国管理故事”的相关讨论则从叙事与话语层面强调,要在全球视野中把中国经验转化为可传播、可对话的管理知识,使之“讲得出来、听得进去、走得出去”^[8-9]。这些真知灼见为本文从知识体系视角审视本土工商管理学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源流与实践沃土。

在上述背景下,从可持续发展视角对本土工商管理学进行系统性重构,已成为一项兼具理论必要性与实践紧迫性的时代课题。因此,亟待学界回应的两个核心问题是:其一,在可持续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双重框架下,本土工商管理学建设面临哪些深层的时代要求?其二,如何构建可行的学科发展路径,以实现其价值导向、知识体系与人才培养模式的整体转型?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正是响应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一宏观战略的微观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为各个学科的发展指明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行动准则。工商管理学作为与经济发展实践联系极为紧密的学科,其知识体系的自主建构绝非单纯的技术性调整,而是深度嵌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思维升级。因此,本研究旨在将哲学社会科学建设要求、学科范式重构与育人实践贯通起来,探索一条有效传导与落实的实现路径。

综上,本文在梳理可持续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相关理论与政策的基础上,构建“战略导向—学科范式—知识生产—人才培养”的分析框架,首先对当前我国工商管理学科在可持续发展导向下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诊断;其次从学科定位、知识体系与人才培养等维度,提炼可持续发展视角下本土工商管理学建设的时代要求;最后提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工商管理学建构路径。本文期望能够加深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中国本土工商管理学学科使命、知识内核和发展逻辑的理解,并推动构建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工商管理学理论体系。

二、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一)传统工商管理理论的范式特征与局限

从学科谱系看,现代工商管理理论主要形成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语境之中^[10]。泰罗的科学管理、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与韦伯的理性—科层制模型,共同奠定了以效率、控制与分工为核心的管理范式^[11-13]。在经济学层面,新古典企业理论以及随后发展起来的现代公司金融理论,将企业定义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理性经济主体,股东价值最大化逐渐成为企业的主导目标^[14-16]。此后,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与资源基础观等进一步丰富了企业治理与竞争优势的分析框架,但整体上仍延续了以经济效率和财务绩效为中心的单一评价逻辑^[17-18]。在这一范式之下,工商管理学被塑造为如何更有效率地组织生产与交易的规范性与工具性知识体系,环境与社会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被视为外生变量或“外部性”,主要依赖政府规制和法律制度加以矫正^[19]。即使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公民等概念逐渐兴起,相关研究也多被纳入“责任是否有利于企业绩效”的功利主义框架之中,而对生态边界、代际正义等议题缺乏系统性关注^[20-21]。

由此可见,在推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方面,传统工商管理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贡献,但在回应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当代全球共识时,其理论与适用性局限日益显现。这一局限性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在核心目标方面,以利润或股东价值为核心的单一目标结构使企业在实践中难以内生地兼顾环境承载和社会公

正,对“经济—社会—生态”三维目标协同缺乏相应的分析工具。第二,在时间尺度方面,以短期财务回报和股东收益为导向的绩效评估体系,难以及时处理长期生态风险、气候变化与代际利益等问题。第三,在理论背景方面,以欧美成熟市场为经验基础的理论建构通过对组织与市场的高度抽象化处理,削弱了对发展中经济体、转型经济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解释力。第四,在价值取向方面,管理知识与技术多被理解为价值中性的效率工具,其背后的价值选择、制度后果以及对公共利益的影响并未得到足够关注^[22]。落实到人才培养上,这种以“狭义效率”为中心的范式导致了以职能型、企业内部管理者为主要培养对象的教育模式。因此,在可持续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推动以“狭义效率”为核心的单一目标逻辑的传统范式,向多目标、多时间尺度和多主体取向的复合逻辑范式转型,已经成为工商管理学科内部发展与回应国家战略命题的共同要求。

(二) 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管理学范式转型

自布伦特兰委员会报告提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以来,可持续发展逐渐完成了从规范性理念到制度化治理框架的转变^[23]。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通过了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经济增长、社会包容与环境保护之间构建起一套相对完备的目标体系和指标体系,使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公共政策与企业战略的重要参照系^[24]。在这一背景下,企业被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行动主体,管理学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全球治理框架的深刻影响。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管理学范式转型的研究脉络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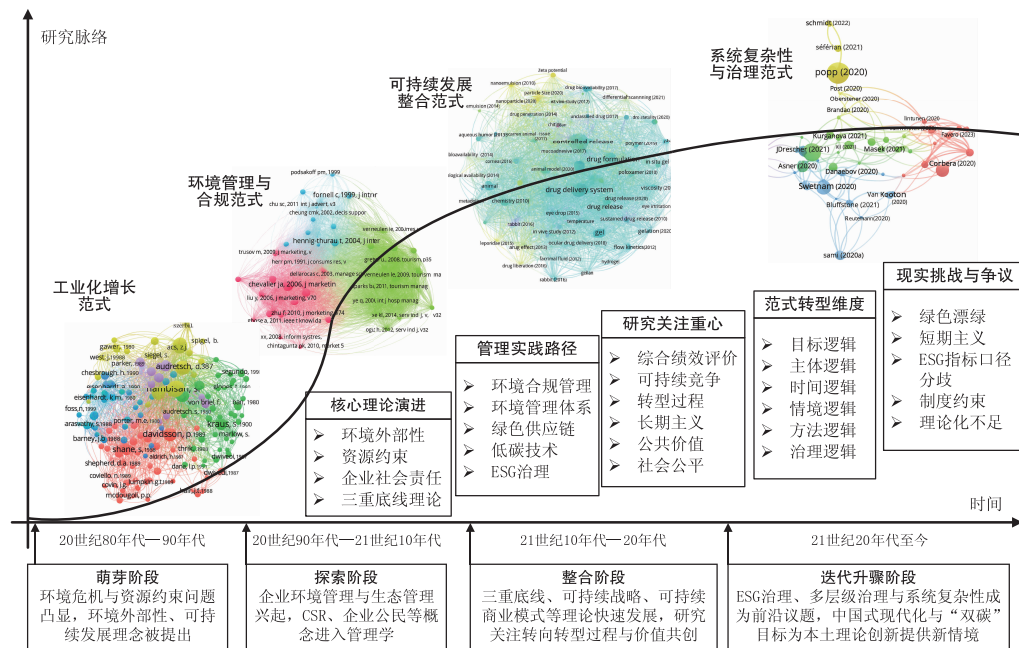


图 1 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管理学范式转型的研究脉络图

首先,在绩效评价逻辑上,从以财务收益为唯一底线的单一绩效观,逐步转向以经济、社会和环境“三重底线”为基础的综合绩效观^[25]。相关研究强调,企业绩效不应仅以盈利能力来度量,还应系统考察其对生态系统与社会体系的正负外部效应,将环境足迹、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等纳入组织绩效评价体系^[26]。这一转向改变了传统工商管理学将环境与社会后果视为“外部性”的处理方式,使可持续发展目标得以嵌入企业战略制定、组织治理、运营管理等关键环节。

其次,在企业与社会关系的界定方面,管理理论的主导视角已由强调股东利益的单一逻辑,逐步转向以利益相关者为基础的多元框架^[27]。利益相关者理论将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政府乃至自然环境等纳入企业活动的相关主体范围,由此重塑了企业决策的正当性来源,要求企业在不同主体之间更加审慎地权衡价值分配与风险承担^[28]。与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核心目标的传统公司理论相比,这一视角更有利于将生态环境保护、劳动者权益、公共健康和社会公正等议题纳入企业治理结构与管理流程之中,为企业在实践中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较为系统的依据和工具^[29]。

再次,从企业战略与组织实践层面看,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企业由被动满足监管的合规要求,逐步迈向在核心战略中主动嵌入环境与社会目标的整合式可持续战略。早期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往往把环境保护和社会公益视为增加合规成本或改善企业声誉的附加性支出^[30],而随着共享价值、可持续商业模式等概念的提出,企业可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低碳供应链协同、循环经济设计等路径将可持续发展内化为新的竞争优势,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同提升^[31-32]。

最后,可持续发展本身具有多目标、多主体、多时间尺度和高不确定性等特征,从而使得管理学研究在方法论上更加重视系统复杂性。与传统以线性因果推断为主的研究相比,近年来有关可持续转型的研究更多引入复杂系统理论^[33]、制度理论和多层级治理理论^[27],强调从系统结构、反馈机制、路径依赖、制度环境等方面理解组织与环境的互动过程^[34]。方法论上的调整既反映了可持续发展的多维复杂性,也为管理学分析提供了跨尺度、跨主体综合考察的新视角。表1对传统工商管理范式与可持续发展导向下本土工商管理范式进行了归纳性比较。

表1 传统工商管理范式与可持续发展导向下本土工商管理范式的比较

维度	传统工商管理范式	可持续发展导向下本土工商管理范式
核心目标	利润/股东价值最大化	经济、社会、环境三维协同,服务国家战略与公共价值
时间尺度	短期绩效、季度/年度回报	长期韧性、代际公平、生命周期管理
理论背景	工业化与自由市场经济	可持续发展、中国式现代化
价值取向	工具理性、效率优先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一,兼顾公平、正义与生态边界
人才培养目标	职能经理人、企业内部管理者	可持续发展治理者、兼具商业能力与公共责任的复合型人才

在中国情境下,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演进与国家层面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呈现出明显的价值同构与目标协同。需要强调的是,本文讨论的“本土工商管理”并不局限于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或某一文化母体的简单回溯,而是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逻辑与特定发展阶段下的治理实践,从制度嵌入、发展阶段嵌入与实践嵌入三个维度来理解“本土”的内涵。制度嵌入是指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总体框架的前提下,从政企关系、国有经济布局、区域协调发展等制度结构出发,重构对企业行为及组织治理的分析逻辑;发展阶段嵌入强调将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所处的历史方位、产业演进路径与技术变革特征纳入理论前提,从而避免以成熟资本主义市场为默认情境的抽象化推演;实践嵌入着眼于中国在绿色低碳转型、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持续展开的治理实践,通过系统梳理和概念提升,将其中蕴含的管理经验转化为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命题与分析框架。

然而,总体来看,可持续发展相关管理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系统耦合仍不充分:在理论层面,如何在吸收“三重底线”、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可持续商业模式等成果的基础上,形成既体现目标与底线约束,又嵌入中国情境与演化特征的学理框架,仍有待于深化;在经验层面,尚缺乏围绕我国企业在绿色低碳转型、乡村振兴、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以及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实践经验而展开的系统梳理与概念提炼,尚未形成在国际学术共同体中具有清晰辨识度的“中国可持续管理理论”板块。

(三)可持续发展视角下本土工商管理学建设的分析框架

本文基于系统论的整体性视角,借鉴多层级治理理论中“宏观战略—中观制度—微观实践”这一传导机制的分析框架,并引入知识生产理论关于问题导向与情境嵌入的观点来构建研究框架。系统论强调任何学科体系都是由多要素构成的开放系统,其运行依赖于要素间的结构性联系与反馈回路^[33];多层级治理理论揭示了国家战略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和组织范式逐级传导并影响具体实践^[35];知识生产理论则强调知识生成与人才培养过程也是参与治理的行动实践^[36]。从知识体系的视角看,上述理论共同揭示了学科体系并非中性的知识堆积,而是国家战略、制度安排与实践活动在知识层面的结构化呈现^[7]。基于上述理论支撑,本文提出“战略导向—学科范式—知识生产—人才培养”四维分析框架,以刻画可持续发展视角下本土工商管理学建设的关键要素以及互动关系,分析框架如图2所示。

首先,在战略导向向学科范式传导的机制中,国家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分别通过目标逻辑、底线逻辑、情境逻辑和演化逻辑四个方面嵌入学科发展之中。目标逻辑是指国家对“双碳”目标、生态文明建设、共同富裕等价值取向的制度性承诺,要求工商管理学在学科定位与研究目标上从单一经济效率转向经济、社会、环境三维协同;底线逻辑强调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与社会公正等不可逾越的约束边界,促使学科建设在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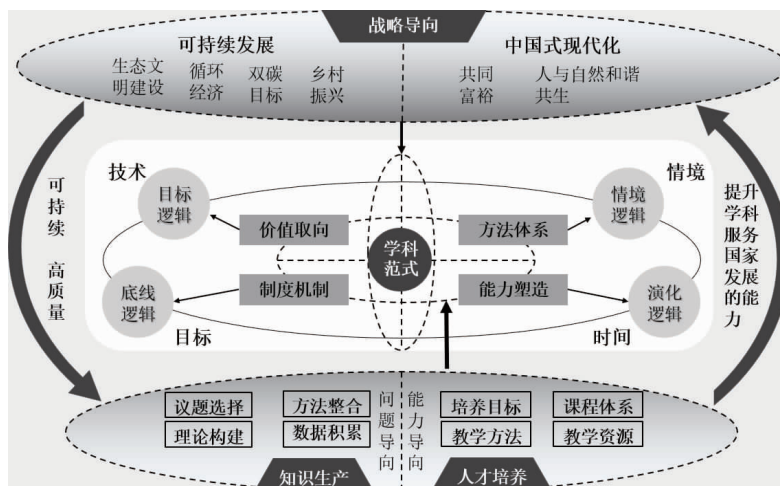


图2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本土工商管理学建设的分析框架

机制上将生态红线、社会底线内生为评价标准和研究前提；情境逻辑体现为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制度环境、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特征，对研究问题和方法体系选择的情境限定；演化逻辑则强调在技术变革、产业升级与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学科范式需具备适应变迁、持续更新的能力。上述四种逻辑共同作用于学科发展，通过重塑价值取向与制度机制，推动学科从以效率和增长为中心的传统范式，转向以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新范式。

其次，在学科范式向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传导方面，学科范式通过方法体系和能力塑造两个中介环节发挥作用。一方面，价值取向与制度机制会反向影响研究的方法偏好与工具选择，例如鼓励采用能够刻画长期效应、多主体互动与系统复杂性的研究方法，推动定量分析与案例研究、情景模拟与政策评估等方法的综合运用；另一方面，学科范式中关于什么人才是理想管理者的隐含假设，会被转化为人才培养体系中的能力要求，具体体现在培养目标设定、课程模块划分、教学方法选择以及实践平台建设等方面。由此，在知识生产维度上，议题选择、理论建构、方法整合与数据平台建设都将围绕战略导向所界定的问题域展开；在人才培养维度上，培养目标、教学方法、课程体系与实践平台则围绕可持续发展治理能力的塑造进行系统设计。

再次，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并非简单并列，而是存在紧密的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知识生产为人才培养提供理念基础和来源，可持续管理领域的新理论、新案例和新数据会被转化为课程内容和教学资源，助力学生对国家战略与可持续发展议题的理解；另一方面，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行动学习项目、校地合作和产教融合实践会促使新的问题意识与经验材料不断涌现，反哺研究议题选择与理论建构方向。基于知识生产与行动导向研究的视角，这种以真实问题为起点、在教学和实践中共同生成知识的过程^[37]，使本土工商管理学成为连接国家战略、组织实践与学术研究的重要媒介。

最后，通过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的联动成果并非止步于学科发展，而是通过两条主要路径回流至国家战略层面。一方面，在知识—政策路径上，围绕绿色转型、乡村振兴以及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等议题积累的理论成果与经验总结，经由政策咨询、标准制定、规划编制等制度化渠道进入公共治理实践领域，对国家战略的目标设定、工具选择和路径安排形成持续性的知识输入；另一方面，在人才—实践路径上，具备可持续治理能力的管理人才进入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具体治理与经营活动中对国家战略进行情境化落实，并在问题识别和制度创新过程中不断生成新的实践需求与制度设想。由此，国家战略不再只是学科发展的外在约束，而是在知识生产、制度演化与实践运行的循环中被持续细化、检验与丰富。

在这一分析框架中，可持续发展视角下本土工商管理学的范式转换，可以理解为一个在战略导向多重逻辑牵引下，经由学科范式调整，在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两个层面实现协同重构，并通过智力供给与人才供给反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动态过程。

三、可持续发展视角下本土工商管理学建设的时代要求

在可持续发展和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本土工商管理学有必要在战略导向、学科

范式、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等层面,对自身的时代定位和发展要求作出重新界定。

(一)学科建设的总体要求

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宏观使命来看,本土工商管理学建设被赋予了超越工具理性、彰显主体性与原创性的时代要求。本土工商管理学不能甘于做西方理论的“阐释者”或中国数据的“验证场”,而必须成为从中国管理实践中提炼新概念、构建新理论、形成新范式的“创造者”,这对学科建设提出了新要求。第一,必须强化问题来源的自主性,即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涌现出的真实管理问题,如绿色转型中的企业战略重构、共同富裕背景下的公司治理创新、新质生产力培育中的组织变革等,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和核心议题,避免沦为西方学术研究的跟随者。第二,必须追求理论建构的原创性,在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管理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致力于对中国企业与社会独特的管理智慧、制度安排和行为逻辑进行学理化阐释、体系化构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工商管理学核心概念、分析框架和理论流派。第三,必须注重话语表达的通达性,既要构建一套能够准确、凝练地概括中国管理实践,并能与国际学界进行有效对话的学术话语体系,也要发展形成一套能将学术语言转化为政策语言、商业语言和大众语言的传播体系,切实提升学科的知识贡献力与社会影响力。这一“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要求,贯穿于国家战略对接、学科范式转型、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二)学科建设要求的四维分析

在战略导向维度,学科建设需要主动对接国家在“双碳”目标、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和数字经济建设等方面的战略要求,将学科发展置于服务国家发展全局与长远利益的坐标系之中。这意味着工商管理学不能仅以企业个体绩效或行业竞争力作为价值尺度,而应以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多重目标协调为根本指向,将“可持续—高质量”发展逻辑内化为学科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基本前提。学科应通过培养适应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管理人才,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在学科范式维度,可持续发展对本土工商管理学提出了范式重构的要求。传统以效率和增长为核心的单一目标范式,需要转向兼顾经济效益、社会公平与生态边界的多目标范式;以理性经济人与工具理性为前提的价值立场,需要引入公共性、责任性和代际正义等规范维度;以欧美成熟市场为隐含情境的抽象理论体系,被建立在中国制度环境、发展阶段和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本土化理论框架所修正和补充。换言之,可持续发展要求本土工商管理学从“解释企业如何更好竞争”扩展为“解释并规范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如何实现更高质量的企业与组织治理”。

在知识生产维度,本土工商管理学需要转向以问题为导向、以本土情境为依托、以跨学科协同为特征的知识生产模式。一方面,研究议题应更加紧密地锚定国家战略实践,推动理论问题从重大现实议题中产生。另一方面,在理论建构上,应在系统吸收三重底线、利益相关者理论、可持续商业模式等国际理论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企业与区域治理实践的长期跟踪、比较与概念提炼,形成既能解释中国经验又具有可传播性的本土理论命题与分析框架;在方法论上,应更多采用纵向追踪研究、比较案例研究、系统动力学或复杂网络建模以及大数据分析等综合方法,以形成非线性演化、跨层级联动与多主体博弈机制,从而提升知识生产对复杂实践场景的刻画能力与解释深度。

在人才培养维度,本土工商管理学建设需要实现从知识传授型教学向能力塑造型教育的整体转型,并根据不同培养层次进行差异化设计。对于本科生的培养,应以夯实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立场与基础认知为重点,通过通识课程与典型案例,将生态文明、商业伦理和社会责任等内容系统嵌入教学过程,初步形成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意识。对于硕士生的培养,应聚焦可持续治理的实践能力与综合分析能力,在传统职能课程体系中深度融入“双碳”目标、绿色供应链、ESG治理等议题,通过行动学习、情境模拟、企业诊断与现场调研等方式,提升学生在复杂真实情境中识别问题、整合资源和提出可行性方案的能力。对于博士生的培养,应突出前沿理论探索与原创性学术创新,引导博士生围绕可持续管理与本土实践交叉领域中的关键学术空白展开研究,鼓励其深度参与跨学科研究,开展扎根企业或地区的长期田野调查与比较研究,在问题驱动的基础上形成具有学理高度和国际可见度的本土理论成果。

综上,可持续发展视角下本土工商管理学建设可从战略导向、学科范式、知识生产、人才培养四个维度构建一个多层次、相互嵌套的体系。表2总结和对比了四个维度的定位、要求和指向。

表 2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本土工商管理学建设的时代要求

维度	时代定位	核心要求	关键指向
战略导向	服务可持续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	主动对接“双碳”目标、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等战略要求	强化学科的国家目标导向性
学科范式	从“效率—增长”转向“可持续—高质量”	重构目标逻辑、价值取向与情境基础,形成本土化可持续发展范式	提升学科的规范性与解释力
知识生产	问题导向与本土嵌入	围绕国家实践议题开展理论创新和方法整合	形成具有中国经验支撑的理论成果
人才培养	可持续治理型管理人才培养	系统融入可持续内容与实践平台,强化责任意识与系统思维	优化服务国家战略的人才供给结构

四、可持续发展视角下本土工商管理学的建构路径

在明确可持续发展视角下本土工商管理学建设的时代要求之后,关键是要在既有制度与资源约束条件下,将规范性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实施路径,该转化过程既涉及战略导向、学科范式、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等之间的结构性衔接,也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范式转换成本、利益格局调整与组织惯性等现实约束。因此,建构路径既需要保持面向未来的应然指向,又需正视“既要效率,也要可持续”的总体决策逻辑。

(一) 战略对接:推进学科规划与国家战略的耦合

在战略导向维度,优先任务是实现学科发展规划与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之间的制度性耦合,解决目标要求与高校资源约束存在张力、学科建设与国家战略契合度不高等问题。一方面,应将可持续发展与高质量发展融入学科规划和评估指标体系,将学科对“双碳”目标、生态文明建设、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知识供给与人才支撑纳入评价框架,实现由“是否涉及相关议题”向“在多大程度上回应国家战略需求”的转变;另一方面,通过设立跨部门协同平台、智库和研究中心等,强化国家层面重大战略任务与高校工商管理学科之间的政策沟通与需求对接,以避免政策目标与学科资源之间的结构性脱节。

具体来讲,在学校层面,可将服务“双碳”目标、生态文明建设、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的要求系统写入工商管理学科的发展规划、专业认证与绩效考核体系中,将相关指标作为学科立项、平台布局和资源分配的重要依据,形成以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制度性约束与激励机制。在院系层面,应在学校总体框架下,结合区域产业结构与地方发展需求,制定服务国家战略的中长期发展方案,成立由院系领导、学科负责人和骨干教师组成的“学科与国家战略对接工作组”,围绕区域发展重点领域形成年度合作项目与课题清单,为科研布局、实践基地建设和人才引进提供清晰导向。在教师队伍层面,可将服务国家可持续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写入专业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引导教师在课程设计、论文指导与实践教学中突出国家战略议题,鼓励参与政策咨询、规划编制与智库研究,并组织学生围绕“双碳”目标、乡村振兴、绿色金融等主题撰写课程论文和毕业论文,开展调研实践与学科竞赛,使战略导向维度的建构通过日常教学科研活动得以具体落实。

(二) 范式重塑:构建可持续发展导向的学科体系

在学科范式维度,可围绕“范式更新—制度固化—话语形成”展开研究,解决单一效率范式占主导、本土可持续话语缺位、范式转型成本高等问题。在范式更新层面,需要在理论课程体系、研究生培养方案以及学术会议、期刊选题中,有意识地引导从单一经济效率范式向可持续发展范式转型,将可持续发展、新发展理念与中国式现代化纳入学科核心理论资源。在制度固化层面,可通过设立“可持续发展与中国式管理”“绿色发展与企业治理”等长期研究方向,逐步将相关议题嵌入学科发展主线。在话语形成层面,则需鼓励研究者在中英文期刊、学术年会和政策咨询实践中,持续提炼并输出具有中国情境特征的可持续管理命题与概念,推动形成具有辨识度的话语体系。

具体地,在学校层面,应通过修订学科建设规划、教学管理办法和学位授予标准,将以“可持续—高质量”为导向的新范式确立为工商管理学科的重要发展方向,在教学指导与学位评定的相关程序中嵌入有关可持续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审议标准,为课程设置、学位论文选题和学科方向调整提供制度依据。在院系层面,可依托既有的学术治理与学科规划框架,设置“可持续管理”“中国式现代化与企业治理”“绿色发展与企业转型”等研究方向,将其作为团队建设、项目布局与青年学者培育的重点板块。在教师队伍层面,则需通过系统培训与教学改革实践,将范式转型落实到教学与科研活动中。一方面,在战略管理、组织行为、市场营销、运营管理等核心课程中系统融入可持续发展案例与情境,围绕“双碳”目标、ESG 治理、乡村振兴等议题设计教学单元;另一方面,引导教师申报相关课程改革与教材建设项目,在教学资源建设中逐步形成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课程—案例—

教材—在线资源包”体系。

(三)知识共创:形成制度化的跨学科协同机制

在知识生产维度,核心在于形成制度化的跨学科协同机制和“问题—理论”双向驱动闭环,解决研究议题碎片化、理论移植与情境不匹配、本土经验概念化不足、跨学科研究评价与资源分配存在障碍等问题。一方面,应成立实体或虚拟的“可持续发展交叉创新中心”,建立以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的项目牵引机制,鼓励由工商管理、环境科学、公共政策、法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联合组队,配套跨学科专项经费与差异化成果评价方案,将政策报告、案例库和数据库建设等纳入科研绩效考核范畴;另一方面,通过系统引入环境科学、公共管理、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推动形成多学科融合的研究范式,并以案例、数据平台和政策咨询成果等多元形态体现研究价值。

具体来讲,在学校层面,应围绕绿色低碳转型、乡村振兴、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协同等国家重大战略议题,建设若干跨学院共享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平台,通过设立校级重大和重点项目,引导不同学院、不同学科教师围绕共同问题域开展协同研究,并在科研管理制度中设置专门的跨学科经费类别及相应评价规则,将高质量政策建议、咨询报告、案例库与数据库建设等纳入科研绩效认定体系。在院系层面,可依托校级平台组建跨专业联合课题组和主题研究集群,围绕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ESG 实践、乡村治理模式创新等议题,建设“中国可持续管理案例库”“区域企业 ESG 数据库”等,将对地方政府与企业实践的长期跟踪研究成果作为可持续管理知识的重要来源。在教师队伍层面,可通过开展嵌入式田野调查、纵向比较案例研究与系统动力学建模等工作,形成立足中国情境的中层理论命题,并积极参与地方规划编制、企业战略咨询及行业标准制定,在“问题—理论—政策实践”的循环中提升知识生产的现实针对性和理论贡献度。

(四)人才再造:遵循分层培养与实践嵌入的培养理念

在人才培养维度,需遵循“分层目标—模块课程—协同平台”的总体思路,系统重塑人才培养体系,以解决培养目标偏职能与效率、可持续治理能力与公共责任意识不足、实践育人成本较高等问题。在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层面,应明确区分不同阶段的能力侧重方向,并设计相应课程模块,本科阶段强调可持续发展基本认知与价值取向,硕士阶段强化综合分析与实训能力,博士阶段聚焦研究前沿与理论创新能力。在实践平台层面,应推动与行业龙头企业、绿色发展示范区和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共建“沉浸式实践基地”,不仅提供实习岗位,还应联合设计基于真实挑战的学位论文和实践项目选题,使人才培养过程直接嵌入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前沿实践场域。

具体地,在学校层面,可从系统思维、长期视角、跨界协同与公共责任意识等方面提出分层能力指标,并在专业评估与质量保障体系中设置相应观测点,同时探索设立“可持续发展荣誉项目”或“精英班”,在课程选修、科研参与和实践机会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在院系层面,应构建“通识课程—学科基础课程—可持续发展方向模块—综合实践”的课程体系,并依托校地共建实践基地与跨学院联合工作坊,形成覆盖课堂与现场的多元育人平台。在教师队伍层面,则应在具体教学中系统引入项目制学习、行动学习和服务学习等方法,围绕地方政府、行业组织和企业的真实问题组建跨年级、跨专业学生团队,组织学生参与科研训练、创新创业和社会实践。

五、启示与展望

本文立足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我国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研究可持续发展视角下本土工商管理学建设的时代要求与实现路径。通过系统梳理传统工商管理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理论,本文将可持续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等纳入学科分析视野,在此基础上构建“战略导向—学科范式—知识生产—人才培养”四维分析框架,揭示了传统以效率和增长为核心的工商管理范式在核心目标、时间尺度、情境假设与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的局限,并据此提出本土工商管理学可持续发展转向的制度性实现路径。

(一)理论启示

在理论层面,本文的研究启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本研究推动了本土工商管理学科价值范式与知识内核的自主重构。通过对植根于工业文明的“效率—增长”传统范式与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可持续—高质量”新范式进行系统化辨异与融通,本文不仅清晰地分析了本土工商管理学在经济、社会、环境三重底线协同以及多主体系统治理等方面的应然取向,还实质性地推动学科核心目标从服务于企业竞争优势的单一经济理性转向深嵌入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复合公共理性。第二,本研究构建了衔接宏观战略与微观实践且以知识体系重构为

主线的自主分析框架。本文提出的“战略导向—学科范式—知识生产—人才培养”四维互动框架,在吸收系统论、多层次治理理论和知识生产理论的基础上,揭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宏观要求向具体学科渗透的多重逻辑(目标、底线、情境与演化)与传导—反馈机制。与既有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体系的研究相比^[7],本文在分析视角上更加强调知识体系内部结构的联动调整,将工商管理学的学科建设上升为管理知识体系重构问题,为超越简单理论移植、形成以中国实践为根基的分析范式提供了新的路径。第三,本研究拓展了本土管理理论创新的叙事语境与话语路径。已有研究从文化叙事视角切入探究了本土管理理论创新问题^[38],本文将本土工商管理学的建构命题置于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更具时代性的国家叙事体系中进行考察,不仅丰富了管理学研究的理论视野,还有助于将“双碳”转型、共同富裕等治理实践转化为具有普遍理论意义上的学术命题,从而为形成标识性中国学术概念、参与并引领全球管理知识对话开辟了新的话语通道。

(二) 实践启示

在实践层面,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与建构路径对高等院校和相关管理部门具有现实参考价值。对于高校而言,四维分析框架可作为开展工商管理学科“可持续发展能力”自我诊断的工具。一是通过对照战略导向要求和学科范式取向,系统检视现有研究议题结构、课程体系与实践平台是否存在目标缺位、情境失配或路径依赖等问题,从而为学科发展规划、科研组织重构以及课程体系优化提供依据;二是以“双碳”目标、乡村振兴、绿色金融、数字与绿色协同等为牵引,搭建跨学科研究平台与本土案例库,推动学术研究、政策实践与教学资源在同一问题域下形成联动。对于管理部门而言,四维分析框架为学科评估与政策制定提供了可操作的结构化视角。一方面,可将服务国家可持续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纳入工商管理类学科建设与专业认证的评价指标体系;另一方面,可建立差异化的支持与激励机制,引导高校在学科布局、资源投入、项目设立和产教融合等方面向可持续发展导向倾斜,从而提升工商管理学科对国家重大战略的整体支撑能力与治理贡献。

(三) 研究展望

未来研究可在本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一方面,可将本文提出的“战略导向—学科范式—知识生产—人才培养”四维框架进一步操作化,构建可观测指标体系,并通过文献计量分析、课程文本分析、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等方法,对关键要素及其作用机制开展系统的经验证据检验,进而识别不同类型高校与不同发展阶段在可持续导向转型中的差异、演化轨迹及影响因素,并对相关改革举措的实际绩效进行评估。另一方面,可在子学科层面展开更具针对性与情境化的研究,围绕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运营管理、会计与财务管理等领域,进一步厘清各子学科在范式转换中的差异化路径、关键机制与制度条件,形成可复制、可比较的子学科转型方案与研究议程,从而推动本土工商管理学可持续转型由总体构想走向可验证、可实施的体系化建构。

参考文献:

- [1] 刘华军,吴倩敏. 新时代十年中国绿色发展之路[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4(3):102-111.
- [2] 李佳,贡森. 联合国 2030 议程:进展、挑战和后续路径[J]. 国际问题研究,2025(5):41-64+139-140.
- [3] 杨友才,何珊珊,牛晓童. 战略联盟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5(4):135-143.
- [4] 王永贵,张二伟,汪淋淋. 多方法研究设计在工商管理学中的应用与国际比较研究[J]. 管理世界,2025(5):133-158+248.
- [5] 黄群慧,邵婧婷. 加快构建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体系[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2):22-36.
- [6] 杜运周,贾旭东,胡国栋,等. 管理哲学[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
- [7] 杜运周,孙宁. 构建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体系:必要性、可行性与思路[J]. 管理学报,2022(6):811-820+872.
- [8] 王凤彬,张雪. 用纵向案例研究讲好中国故事:过程研究范式、过程理论化与中西对话前景[J]. 管理世界,2022(6):191-213.
- [9] 丁元竹,沈艳,刘培林,等. 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J]. 管理世界,2021(9):1-35.
- [10] Chandler A D. The emergence of managerial capitalism[J]. Business History Review,1984,58(4):473-503.
- [11] Wrege C D, Perroni A G. Taylor's pig-tale: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Frederick W. Taylor's pig-iron experiment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74,17(1):6-27.
- [12] Breeze J D. Harvest from the archives: The search for fayol and carlioz[J]. Journal of Management,1985,11(1):43-54.
- [13] Hall R H. The concept of bureaucracy: An empirical assessment[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63,69(1):32-40.
- [14] Sundaram A K, Inkpen A C. The corporate objective revisited[J]. Organization Science,2004,15(3):350-363.
- [15] Jensen M C. Value maximization, stakeholder theory, and the corporate objective function[J]. 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2001,14(3):8-21.

- [16] Fama E F, Jensen M C.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J].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83, 26(2): 301-325.
- [17] Williamson O E.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How it works; where it is headed[J]. De Economist, 1998, 146(1): 23-58.
- [18] Barney J B. Resource-based theories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A ten-year retrospective on the resource-based view[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1, 27(6): 643-650.
- [19] Shrivastava P. The role of corporations in achieving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 20(4): 936.
- [20] Margolis J D, Walsh J P. Misery loves companies; Rethinking social initiatives by busines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3, 48(2): 268-305.
- [21] Orlitzky M, Schmidt F L, Rynes S L. Corporate social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A meta-analysis[J]. Organization Studies, 2003, 24(3): 403-441.
- [22] 肖红军, 阳镇. 可持续性商业模式创新: 研究回顾与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0(9): 3-18.
- [23] Biermann F, Kanie N, Kim R E. Global governance by goal-setting: The novel approach of the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J]. Current Opinion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2017, 26-27: 26-31.
- [24] Colglazier W.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 2030[J]. Science, 2015, 349(6252): 1048-1050.
- [25] 王双进, 田原, 党莉莉. 工业企业 ESG 责任履行、竞争战略与财务绩效[J]. 会计研究, 2022(3): 77-92.
- [26] 谢萌, 王翌秋, 徐杨. 上市公司 ESG 责任履行的经济效应研究——基于长期和动态视角[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24(6): 54-72.
- [27] 王涛, 罗开帆, 于超. 制度复杂性下的企业 ESG 实践: 研究综述与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5(4): 21-39.
- [28] 姚会娜, 张金昌. 企业 ESG 表现与商业信用融资——基于信号理论视角[J]. 统计与决策, 2025(15): 139-143.
- [29] 解学梅, 朱琪玮. 企业绿色创新实践如何破解“和谐共生”难题? [J]. 管理世界, 2021(1): 128-149+9.
- [30] 张志红, 王露露, 宋艺.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能否提升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4(4): 103-115.
- [31] 纪玉俊, 宋皓. 制造业集聚如何赋能企业绿色创新? [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25(5): 100-111.
- [32] 桂良军, 王暖欣. 企业碳排放、碳信息披露与盈余操纵[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25(1): 66-77.
- [33] 汪寿阳, 胡毅, 熊熊, 等. 复杂系统管理理论与方法研究[J]. 管理科学学报, 2021(8): 1-9.
- [34] 王琳, 陈梦媛, 牛璐. 企业绿色创新路径构建及动态演化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21(3): 141-154.
- [35] 陈靖, 徐灿, 洪伟. 数字技术与多层级治理模式的变迁: 以空气污染治理为例[J]. 公共行政评论, 2025(4): 63-80+197-198.
- [36] 刘宝存, 张金明. 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视角下研究生培养模式变革研究[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3(7): 73-81.
- [37] 李兴旺, 张敬伟, 李志刚, 等. 行动研究: 我国管理学理论研究面向实践转型的可选路径[J]. 南开管理评论, 2021(1): 181-191+201+232-233.
- [38] 杨强, 霍佳乐, 鲁艺, 等. 乡音的力量——乡村振兴背景下方言直播对农产品销售的双刃剑效应[J]. 南开管理评论, 2024(7): 49-62.

[责任编辑: 王丽爱]

The Imperatives of the Times and the Pathway to Building Indigenous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from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LU Hualiang, FENG Liwei, YANG Qiang

(School of Business,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hina's efforts to advance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roug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tradi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aradigm centered on efficiency and growth is facing increasingly salient tensions between its single-objective structure and the plural development goals embodied in the 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Building 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conven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sustainable management theories, and proceeding from a knowledge-system perspective, this study develops a four-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national strategy-disciplinary paradigm-knowledge production-talent cultivation" to examine the contemporary imperatives and constructive pathways for developing indigenous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cholar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study argues that, at the national-strategy level, indigenous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eeds to reinforce its disciplinary positioning in ser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t the disciplinary-paradigm level, it should shift from a single-objective paradigm of "efficiency-growth" to a composite logic oriented toward "sustainability-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at reconstructs the very meaning of efficiency; at the level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t should promote problem-driven inquiry, local embeddedness,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and at the level of talent cultivation, it should move from training function-oriented managers to cultivating governance-oriented management talent for sustainability. Accordingly, this paper proposes pathways such as aligning disciplinary planning with national strategic institutions, optimizing sustainability-oriented research evaluation mechanisms, and coordinating reforms of curriculum systems and practice platforms,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for the indigenization and sustainability-oriented transformation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the new era,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institutional reference centered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its knowledge system.

Key Words: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isciplinary paradigm; talent cultiv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